

试论广东明清时期的陶瓷手工业

邓宏文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广东广州, 510075

内容提要: 广东明清时期陶瓷工场数量众多,生产面貌繁荣,但是进行过考古勘探或发掘的窑址较少,刊布过资料的更少。这一时期,广东陶瓷手工业的主要特征是窑炉类型多样,产品种类丰富,生产面貌复杂,匣钵、垫饼、垫柱等窑具多见,常见福、禄、寿、富、玉等文字和商号款识。青瓷类产品的胎釉特征、装饰风格、装烧工艺和窑炉技术与元代后期至明代的浙江龙泉窑具有可比性;青花瓷类产品可以分为明代中晚期、清代前期和清代后期至民国三个不同时期,烧造的产品也存在较大差异。本文认为,资源条件、技术传承与交流以及明清时期的海外贸易是影响广东明清时期陶瓷生产的三个重要因素。

关键词: 广东 明清时期 陶瓷 手工业

广东明清时期陶瓷生产面貌繁荣,陶瓷工场众多,分布广泛,陶瓷产品种类丰富,产量庞大。由于考古勘探或发掘的窑址甚为稀少,刊布过资料的更少,窑场分布、窑炉种类与数量、产品品种与质量、工艺水平、生产历史等,多仅以文物普查等地面踏查为据,不甚了了;一些论述因依据阙如而众说纷纭,无法详考。^[1] 广东陶瓷考古的综合研究,大约以2000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2] 由于时间晚近,部分清代窑场的生产还延续至民国时期,广东明清陶瓷考古和研究素来颇不受重视,个案分析和综合论述相较于其他时期皆显薄弱。

一

广东明清时期主要陶瓷品种有广彩、广均、青瓷和青花瓷。广彩即广州织金彩瓷,其创烧约在清初,生产延续至当代^[3],是广州地区生产的以外销为主、二次烧成的低温釉上彩瓷,其最初的颜料、素坯和制作工匠皆来自景德镇。《中国陶瓷史》略谓:“广东广窑,模仿洋瓷,甚绚彩华丽,乾隆唐窑曾仿之,又尝于景德镇,贩瓷至粤,重加绘画,工细殊绝,以销售外洋。”^[4] 刘子芬《竹园陶说》亦云:“清代中叶海舶云集,商务繁盛,欧土重华瓷,我国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烧造白瓷,运至粤垣,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于珠江南岸之河南开炉烘染,制成彩瓷,然后售至西商”,即“粤人所称之河南彩或曰广彩者”。^[5]

广均是明清时期佛山石湾窑模仿钧窑而烧制的窑变釉陶瓷器,其“仿中有创”并“更有创造性的

[1] 曾广亿:《广东瓷窑遗址考古概要》,《江西文物》1991年第4期

[2] 邓宏文:《试论广东宋元时期的陶瓷手工业》,《岭南印记:粤港澳考古成果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历史博物馆2014年,第144—159页。

[3] 黄静:《悠远而美丽的传奇:广彩瓷器解读》,广东省博物馆编:《重彩华章:广彩瓷器300年精华展》,岭南美术出版社2014年,第301—315页。

[4] 吴仁敬、辛安潮:《中国陶瓷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08页。

[5] 刘子芬:《竹园陶说》,孙彦点校整理:《古瓷鉴定指南三编》,燕山出版社1993年,第93—94页。

发展”^[1]。许之衡言：“广窑。宋南渡后所建，在广东肇庆、阳江。胎质粗而色褐，所制器多作天蓝色，惟不甚匀耳。……广窑又名泥均，盖以胎骨系以乌泥制成，而仿宋均青色之釉汁也……广窑在粤名曰石湾，盖南海县佛山镇之一村名也，自明时已迁于此，宋阳江旧窑，今日早已消灭矣。”^[2]刘子芬言：“广窑即石湾窑，在广州佛山镇之石湾村……明时曾出良工仿制宋均红、蓝窑变各色。”^[3]许、刘“石湾仿均”说言之凿凿，广窑为宋南渡后建于肇庆、阳江，明代从阳江迁至石湾等则不足信。据说在乾隆时期，广彩的制作作坊“竟有一百多个”^[4]，然皆位于广州珠江南岸，“广均”的生产则非石湾莫属，二者产地单一，考古材料匮乏。和陶瓷文献“广窑”非“广彩”即“广均”不同的是，广东陶瓷考古的主要发现为青瓷和青花瓷，这一情况和方志的零星记载比较吻合，康熙《高要县志》载：“陶器，白土窑，多为缸、瓮、缶、罍之属，遍给百越。其瓷窑，出阳春、新兴，皆闽人效龙泉窑为之，然不能精也。”民国《清远县志》载：“滨江石坎向有陶窑数家，制造碗、碟、瓶、瓿各物，亦颇坚实，惜徒守旧，止造粗器”，^[5]亦为本文论述的重点。

目前，见诸报道的广东明清窑址超过百处，分布于除清远、深圳和珠海3市以外的其余18个市，梅州、湛江、茂名、河源、韶关和潮州发现数量较多。窑址分布的密集程度潮州独占鳌头，其次为茂名、阳江、揭阳、湛江、河源、梅州、汕头和中山，肇庆、广州、惠州和云浮等市零星分布。广东明代各府（直隶州）中，潮州窑场发现数量最多，分布也最为密集，可谓一枝独秀；其次为惠州、肇庆和高州，南雄因领县少，窑场分布亦显密集。清代各府（直隶州、厅）中，高州、惠州、潮州、广州和嘉应窑场发现数量较多，窑场分布以高州最为密集，其次为阳江、嘉应、惠州、南雄和潮州。两朝相比，各地平均窑场数量变化不大，清代潮州与嘉应窑场合计占比较明代潮州下降明显，高州、广州等窑场占比上升显著，高州占比无出其右，成为清代广东陶瓷生产不可忽略的重要地区。^[6]

广东明清陶瓷生产的主要特征是窑炉类型多样，常见龙窑和馒头窑，另有阶级窑和睡地窑等，有的窑场并存多种窑炉；产品种类丰富，按质地可分为瓷器、陶器和釉陶器，按用途可分为日用陶瓷和建筑陶瓷；生产面貌复杂，既有生产集约化、精细化和专门化程度较高的如水巷大盆行专烧大盆等单一品种的窑场，又有陶、瓷兼烧或先烧日用陶瓷后改烧建筑陶瓷的窑场；匣钵、垫饼、垫柱、火照等窑具多见；碗底常见福、禄、寿、玉等文字或商号款识。其中，进行过考古调查、勘探或发掘的窑址有惠东白马窑^[7]、惠东三村窑^[8]、饶平九村窑^[9]、博罗角洞山窑和揭阳岭下山窑^[10]，大埔余里窑、电白上村窑、揭西宫墩窑和东莞清溪碗窑也进行过发掘，惠东白马窑进行过复查，但资料尚未正式发表。

二

青瓷窑场主要有惠东白马和三村、大埔余里和板坑等，板坑窑兼烧青花，代表性窑场为白马窑和余里窑。青瓷产品多为碗、盘、碟、杯、豆、双耳瓶、香炉等日用器皿，尤以斜腹或直腹圈足碗、敞口或敞口折腹圈足盘为大宗。碗、盘轮制规整，胎体较厚，胎色灰或灰白，胎体致密坚实。青釉玻化良好，

[1]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441—442页。

[2] 许之衡：《饮流斋说瓷》，郑廷桂等辑：《中国陶瓷名著汇编》，中国书店1991年，第144页。

[3] 刘子芬：《竹园陶说》，孙彦点校整理：《古瓷鉴定指南三编》，第93页。

[4]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第453页。

[5] 李纪贤：《方志等古文献中有关窑址的记载（二）》，文物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63、168页。本文校改了标点和文字。

[6] 广东省文化厅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广东分册》，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89年，第215—491页。

[7] 曾广亿：《广东惠阳白马山古瓷窑调查记》，《考古》1962年第8期。

[8]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华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广东惠阳新庵三村古瓷窑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第4期。

[9] 何纪生、彭如策、邱立城：《广东饶平九村窑址调查记》，文物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第155—161页。

[10] 曾广亿：《广东博罗、揭阳、澄迈古瓷窑调查》，《文物》1965年第2期。

光泽度强,青色呈色多样,有浅青、深青、青黄、青褐、青白;施釉较厚,釉层均匀,内壁一般满釉,外壁施釉或至中腹,或至底腹,圈足内壁和外底一般露胎,足壁可见流釉。除素面或刻划简单弦纹外,碗外壁常见刻划菊瓣纹或伞骨纹,盘、折腹盘内壁则刻划瓣形纹,刻法流畅,但较随意。部分器物内底心刻印团花、“福”“寿”“青”等图案或文字。使用纵截面呈M形的匣钵单件正烧,匣钵与器物之间以垫饼或谷壳、木糠间隔。火照应用普遍。窑炉类型除三村窑为马蹄形馒头窑外,最常见的为分室龙窑^[1]。

青瓷的胎釉特征、装饰风格、装烧工艺和窑炉技术,与元代后期至明代的浙江龙泉窑可比程度较高^[2]。广东仿龙泉青瓷的记载除前引康熙《高要县志》外,亦见于雍正《广东通志》,内容基本相同。阳春、新兴的瓷窑是否皆由闽人经营尚不得而知,但广东窑场与福建存在千丝万缕般联系应该可信。福建毗邻浙江,“效龙泉”更早,一些宋元窑场如莆田庄边窑的部分产品,就“显然是受到了龙泉窑的影响”。由于福建明窑“多属于明代中晚期”,并“可能与嘉靖以后实行海禁开放有关”^[3],广东仿龙泉青瓷窑场的时代应与其相当或略晚,即以嘉靖至崇祯时期的明代晚期为主。

广东的仿龙泉青瓷,虽未见到“釉层丰厚,滋润如玉的高档精美产品”^[4],但不少产品胎质坚硬细密,釉色晶莹明亮,胎釉结合紧密,造型灵巧端庄,“然不能精也”当相较于龙泉窑烧造的供皇室、贵族使用的精品而言。方志记载的青瓷生产,除明末阳春、新兴的仿龙泉窑外,尚有万历龙川县“青磁器……俱出广信”,民国大埔县“青碗窑,区署北二十里……当高陂、同仁两区交界要道”^[5]等。明清《大埔县志》另有“货属,瓦器、碗、碟之类”,“瓷器,出源高甲、九子畲,坚致雅润,人家常用,并贩卖各处”^[6]等语,其记载与大埔余里等青瓷窑址的考古发现比较吻合,而“坚致雅润,人家常用,并贩卖各处”也可视为广东明代仿龙泉青瓷窑场的集体写照。

青花瓷窑场主要有博罗角洞山、揭阳岭下山、饶平九村、电白上村、揭西宫墩和东莞清溪碗窑等,有的兼烧青白瓷或青瓷。已发表的相关简报认为,博罗、揭阳两窑属成化以后的明代中晚期;九村窑则被分为四期,第一期以青瓷为主,后三期全为青花瓷。其中,九村窑青花瓷有从细密薄胎到粗松厚胎、青花呈色从暗淡静雅到光亮轻浮、青花纹样从写实认真到写意潦草的变化规律,因垫沙支窑而形成的沙足器在第二期比较流行,第四期则出现大量商号款识。

大致而言,广东青花瓷的主要器类有碗、盘、碟、杯、瓶等,青花多饰于外壁和内底,常见纹样有吉祥文字、诗文、花草、山水、人物、动物等;使用筒形匣钵叠烧或匣钵单烧,叠烧方式有同类器物相叠、大小器物相叠及二者的结合等多种,亦见盖身合烧;器物与匣钵之间用垫饼或垫沙间隔,器物之间一般无间隔具,故叠烧而成的碗、碟底足无釉,内底则成涩圈;多用火照;常见窑炉类型除普通龙窑和阶级式龙窑外,仍以分室龙窑为多。

广东青花瓷器的生产历史虽比较悠久,窑址众多,产量庞大,但总体水平一般。方志记载广东明清陶瓷生产以日用器皿为大宗,玩品、陈设艺术品等少有,坚实耐用、具一定规模、销路较广是其共性。“遍给百越”的高要白土窑,其制品既“模型古朴,人惮改良,家有其物,往往经百余年或数十年

[1] 白马窑和余里窑的窑炉平面皆作长条形,底呈斜坡,窑床上砌有多道隔墙,隔墙下设烟火孔,属分室龙窑而非“阶级窑”。阶级窑窑室单独砌筑,每间窑室的窑床呈水平状,窑顶则逐段抬升;分室龙窑每间窑室的窑床呈斜坡状,窑顶形态和普通龙窑类似。刘振群:《窑炉的改进和古陶瓷发展的关系》,《华南工学院学报》1978年第3期。

[2] 朱伯谦:《龙泉青瓷简史》,浙江省轻工业厅编:《龙泉青瓷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4—29页。

[3] 曾凡:《福建陶瓷考古概论》,福建省地图出版社2001年,第159—160、181页。

[4] 朱伯谦:《龙泉青瓷简史》,《龙泉青瓷研究》,第11页。

[5] 李纪贤:《方志等古文献中有关窑址的记载(二)》,文物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代窑地调查发掘报告集》,第164、166页。

[6] 李纪贤:《方志等古文献中有关窑址的记载(二)》,文物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代窑地调查发掘报告集》,第166页。

而不一易者”^[1]，又“质坚色黑，状如生铁，贮油载水，久而不渗”^[2]，故此等商民应用品销路最广。

康熙时，廉江的“两家滩、山口、横山、息安多瓦器，近有磁器亦散各墟”，又有“下塘窑一处，坐落丰二都下塘村，烧瓷碗。狗尾岭窑一处，坐落丰二都狗尾岭村，烧碗口”^[3]。惠来县东溪窑山“乡人搭茅屋数间，以水碓春泥，用以陶碗”，距县西北六十里的北溪窑山“居民春泥陶碗，与东溪同供远近器用”。^[4]民国时，始兴县的“砖、瓦、瓦缸出朔源、跃溪、二约，以土质烧成，大小不一，为盛水及盛油之用”，其瓷器有“跃溪、约之、铁寨等村所制碗、盘、杯、碟，质美价廉，销流于本境及邻境甚多”。^[5]清远县“各乡所用碗、碟全用石坎土货，以其质厚而坚也”^[6]；丰顺县潭江圩“近圩有碗窑百余所，为产碗集散地”，其以“陶土为碗”，“运销佛山、南洋”。^[7]上述记载涵盖陶器和瓷器，但凡为瓷器者，皆当以青花为主，质厚而坚、“止造粗器”、“供远近器用”等和青花瓷窑的考古材料可相印证。

三

广东瓷土资源比较丰富，且一些瓷土品质很高，为陶瓷手工业生产奠定了基础。潮州瓷土“产区以韩江流域之大埔、丰顺、潮安、饶平为主，此外惠来亦有之，而以潮安、大埔产最富”，“大埔路磁土产高陂，环河东数十里之山皆是也。其最佳者为山坪、雷公坪”。^[8]龙门县“八字山，其土细润，可为瓦器”；清远县捕属百家村、大燕龙塘等处均产瓷土，“每输石湾以制陶器”；翁源县狮子岭“下产白土，居民置窑烧为器具”；乐昌县“白土，出九峰，土人用以制造瓦器”；廉江县“碗泥，第一区双桥营最富，多运销于安南、东兴，第二区太平店亦有出产，可制瓷器”。^[9]粤东、粤西、粤北及珠江三角洲皆有瓷土产区，瓷土亦曾作为商品，在粤境内外流通。潮州所产飞天燕精泥，最为有名。虽然石湾“陶用土坯，其土皆从贩运而来”^[10]，但多数广东明清窑场，仍将丰富的瓷土作为窑场选址的首要条件。惠东白马窑分布于东江第二大支流西枝江上游，大埔余里窑毗邻韩江干流，便捷的河道运输，充足的生产用水，也是窑场选址的必备条件。

技术的传承与交流，为陶瓷手工业发展提供了保障。明代窑场分布最密集、发现数量最多的潮州，在北宋时便是广南东路的主要陶瓷产区。“北宋潮州城东有水东窑即今笔架山麓，明时韩山东有百窑村，桑浦山麓亦有磁窑。”^[11]彼时潮州窑业的兴盛，得益于其悠久而深厚的瓷器生产历史。

技术传播与交流往往和人口流动有关。我国历史上曾有过三次全国范围内的北方人口南迁高潮，最晚的一次发生在两宋之际的“靖康之乱”以后。明清时期人口流动在局部地区也曾出现过高潮^[12]，该时期广东人口流动大致有从外省流入广东、广东境内交叉流动和从广东流向外省及海外这三个方向，其中流入的人口以农业、手工业或商业为生，一些地方流入人口占比过半，如明代始兴县就曾有

[1] 李纪贤：《方志等古文献中有关窑址的记载（二）》，文物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代窑地调查发掘报告集》，第167页。

[2] 李纪贤：《方志等古文献中有关窑址的记载（二）》，文物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代窑地调查发掘报告集》，第166页。

[3] 李纪贤：《方志等古文献中有关窑址的记载（二）》，文物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代窑地调查发掘报告集》，第169页。

[4] 李纪贤：《方志等古文献中有关窑址的记载（二）》，文物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代窑地调查发掘报告集》，第165页。

[5] 李纪贤：《方志等古文献中有关窑址的记载（二）》，文物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代窑地调查发掘报告集》，第170页。

[6] 李纪贤：《方志等古文献中有关窑址的记载（二）》，文物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代窑地调查发掘报告集》，第163页。

[7] 李纪贤：《方志等古文献中有关窑址的记载（二）》，文物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代窑地调查发掘报告集》，第165页。

[8] 梁宪华、翁连溪编著：《中国地方志中的陶瓷史料》，学苑出版社2008年，第330页。

[9] 李纪贤：《方志等古文献中有关窑址的记载（二）》，文物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代窑地调查发掘报告集》，第163、164、169页。

[10] 梁宪华、翁连溪编著：《中国地方志中的陶瓷史料》，第335页。

[11] 梁宪华、翁连溪编著：《中国地方志中的陶瓷史料》，第331页。

[12] 邹逸麟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52—153、228页。

七成人口来自江西和福建。^[1]广东明代仿龙泉窑址虽未发现可以佐证窑主身份的直接证据,但人口迁移流动的情况却增加了“闽人效龙泉窑为之”的可信程度。综合来看,广东明清时期陶瓷手工业主要受到江西、福建两地窑业的影响,而来自福建的影响则更加直接和深刻。此外,广东青花瓷窑场的工艺和产品风格分期明显而分区模糊,这和广东境内人口流动形成的技术传播和交流也有密切关系,如大埔县毗邻饶平县,其“高陂瓷业,古老相传,则清初始,由饶平传入”^[2],相邻地区间瓷器生产技术的传输可见一斑。

明清时期的海外贸易促进了广东陶瓷业的发展壮大。“广东在南服最为完固,地皆沃衍,耕耨以时,鱼盐之饶,市舶之利,资用易足也……且也放乎南海,风帆顷刻击楫江津,扬舲淮渚,无不可为也”^[3],海外贸易对陶瓷手工业的影响彰明较著。明代海外贸易波谲云诡,面貌畸形。拉开海外贸易帷幕的是朝贡贸易,约至永乐初年,朝贡贸易管理体系已渐趋成型。不过,一边是朝贡贸易的兴起,一边却是严苛的海禁接踵而至。洪武二十七年(1394),“甲寅,禁民间用番香、番货。先是上以海外诸夷多诈,绝其往来,唯琉球、真腊、暹罗许入贡。而缘海之人,往往私下诸番贸易香货,因诱蛮夷为盗,命礼部严禁,绝之,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寘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4]。永乐五年(1407)诏:“不许军民人等私通(外)境,私自下海贩鬻番货,违者依律治罪。”^[5]

有明一代,海禁之声不绝于耳。宣德八年(1433)“严私通番国之禁”,上谕顾佐等曰:“私通外夷已有禁例。近岁官员军民不知遵守,往往私造海舟,假朝廷干办为名,擅自下番,扰害外夷,或诱引为寇比者,已有擒获,各寘重罪。尔宜申明前禁,榜谕缘海军民,有犯者许诸人首告,得实者给犯人家货之半,知而不告及军卫、有司纵之弗禁者,一体治罪。”^[6]隆庆初年虽有短暂的开禁,但重严海禁之议并未销声匿迹。万历四十年(1612),浙江总兵官杨崇业道:“嘉靖之季,海禁大弛,遂有宋素卿、徐海、曾一本、王直之徒为之祸始,今又十倍往时。”^[7]除虑“诸夷多诈”外,化解海寇、倭寇及正德以后葡萄牙人、荷兰人等多次前来形成的海防危机,是海禁最为表面和直接的原因。海禁愈严,私通获利愈丰厚,犯禁者愈众,民间贸易愈发达。

广东“地控夷邦”^[8],扼交通西洋之要冲,在明代海上陶瓷贸易中占重要地位。东西二洋是明代海上贸易的两大方向,因倭寇之故,往日本等东洋方向的贸易举步维艰。西洋地域宽广,国家众多,其贸易繁华程度,远在东洋之上。明代闽、浙市舶分别管理琉球、日本一国贡务,浙江省市舶还“旋设旋罢”,唯广州市舶理多国贡务,故“西洋番舶之辏”于广东。^[9]景泰三年(1452),爪哇国使臣奏:“入贡时所驾船为风所荡,损漏不堪,乞令(广)东三司修造……又乞(以)赐物於广东贸易……磁器之类。”^[10]合法的陶瓷出口,广东当居首位。

不过,广东私通之盛,与沿海他地如出一辙。弘治六年(1493)闵珪奏:“广东沿海地方多私通番舶,络绎不绝,不待比号,先行货卖。”^[11]正德九年(1514)陈伯献奏:“岭南诸货,出于满刺加、暹罗、爪哇诸夷,计其产不过胡椒……之类,非……民生一日不可缺者,近许官府抽分,公为贸易,

[1] 吴建新:《明清广东人口流动概观》,《广东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

[2] 梁宪华、翁连溪编著:《中国地方志中的陶瓷史料》,第331页。

[3] [清]顾祖禹著,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輿记要》,中华书局2005年,第4575页。

[4] 《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三十一“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甲寅”。

[5] 《明太宗实录》卷六十八“永乐五年六月癸未”。

[6] 《明宣宗实录》卷一百三“宣德八年七月己未”。

[7] 《明神宗实录》卷四百九十六“万历四十年六月庚午”。

[8] 《明世宗实录》卷一百十八“景泰三年十月辛酉”。

[9] 《明神宗实录》卷八十一“万历六年十一月辛亥”;[清]梁廷相总纂,袁钟仁校注:《粤海关志》卷四《前代事实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48、50—52页。

[10] 《明英宗实录》卷二百十六“景泰三年五月丁未”。

[11] 《明孝宗实录》卷七十三“弘治六年三月丁丑”。

遂使奸民数千，驾造巨舶，私置兵器，纵横海上，勾引诸夷，为地方害。”^[1]由此可见，违禁私通仍然是陶瓷外销的主要方式。

陶瓷交易个案的情况则比较复杂。正统六年（1441）郑颢等奏：“琉球国通事沈志良、使者阿普斯古驾船载瓷器等物，往爪哇国买胡椒、苏木等物”^[2]，船货产地与船主籍地出现不同。1552年8月方济各·沙勿略随圣克罗切号到广东上川岛，“时中国禁与葡萄牙人通商，葡萄牙人只能与华人私相贸易；广东官吏有利可图，遂视若无睹。中国船舶载土货至上川，以易欧洲船舶所载之货物而归”^[3]，经转手或多次转手完成的交易也不鲜见。

广东出口陶瓷的产地并不单一，譬如正德时，来自内地的丝绸、瓷器等云集广州，供外商采购，“内地货物如山，用之不绝”^[4]。实际上，出口对广东窑业有刺激和促进作用。广东明代仿龙泉青瓷产品除“人家常用”外，还“贩卖各处”，当遍指境域内外。以朝贡贸易等合法渠道出口的陶瓷采购渠道较多，对出口地陶瓷生产的促进，常常不如私通交易来得直接。由于宦官监管市舶^[5]，约在成化以后的15世纪后期，违禁私通呈现井喷现象。正德十年（1515）礼部覆高公韶奏：“旧例岭南诸番入贡，其所附货物官税其半，余偿之直，其不以贡来者，不许贸易，与之交通者，罪至死。后以中人镇守，利其入，稍弛其禁。顷者，权豪贪纵，任其住泊，遂令诸夷交结奸民，肆行剽掠，貽患地方。”^[6]因此，广东窑业受外销影响最为直接和明显的时期当晚至成化以后。

四

值得注意的是，海禁政策对朝贡贸易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弘治六年（1493）礼部称：“据本部所见，则自弘治元年以来，番舶自广东入贡者，惟占城、暹罗各一次。意者私舶以禁弛而转多，番舶以禁严而不至。”^[7]朝贡贸易的不稳定可能导致供求失衡，增加扩大再生产的风险，滋生贸易掇客和囤积居奇的商人阶层。实际上，明代的海外贸易，始终存在特殊而不容忽视的中间商——“官设牙行”“代市舶提举盘验纳税”，而由广、福、泉、徽等地商人“争趋若鹜”形成的广东“牙行”，则最为兴盛^[8]。

此外，明代后期还有两个显著变化：其一，“佛朗机正德中始入”，嘉靖八年（1529），“广东有司乃并绝安南、满刺加，诸番舶皆潜泊漳州，私与为市”^[9]；嘉靖三十四年（1555）屠仲律道：“夫海贼称乱起于负海，奸民通番互市，夷人十一……漳、泉、福人十九，虽概称倭夷，其实多编户之齐民也……曩岁漳、泉滨海居民，各造巨舟”^[10]，故漳州等福建私市的活跃，当早于隆庆开禁。嘉靖以后，以漳、泉、福人等为代表的福建私商成为违禁通番的主力，加之西方“远夷”扩大了外销市场，故明代后期福建外销瓷生产受到的推力要强于广东，也强于其他地区。其二，陶瓷等对外贸易中澳门地位显著上升，葡萄牙人盘踞澳门后，西方列强纷纷求市于华，澳门屡屡成为首选的中转站。

[1] 《明武宗实录》卷一百十三“正德九年六月丁酉”。

[2] 《明英宗实录》卷八十六“正统六年一月己丑”。

[3] [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第3—4页；黄薇、黄清华：《广东台山上川岛花碗坪遗址出土瓷器及相关问题》，《文物》2007年第5期。

[4] 罗瑞洛：《广州葡囚信》，金国平编译：《西方澳门史料选萃（15—16世纪）》，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1—107页。

[5] 王川：《市舶太监与南海贸易——广州口岸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

[6] 《明武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三“正德十年四月丙午”。

[7] 《明孝宗实录》卷七十三“弘治六年三月丁丑”。

[8]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45页。

[9] 《明世宗实录》卷一百六“嘉靖八年十月己巳”。

[10] 《明世宗实录》卷四百二十二“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壬寅”。

清代海外贸易对广东陶瓷生产的影响略论及道光二十年（1840）年前。清初因南明抵抗不断，东南海疆战火频仍，海禁颇严。康熙二十二年（1683）南明溃灭，次年海禁“始少为变通，而犹禁商舶不得往南洋”。雍正五年（1727）重开南洋海禁，“商民俱得携带内地货物前往贸易”，“于是东南舟楫之区，鲸波不惊，商渔乐业，荷兰、暹罗等国，矫首面内，不憚超数十更以来；其他小弱附景希光者，殆不可悉数”。^[1]

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政府设粤海、闽海、浙海、江海四榷关于广州之澳门、福建之漳州、浙江之宁波、江南之云台山，其中“天下海关在福建者，辖以将军；在浙江、江苏者，辖以巡抚；惟广东粤海专设监督，诚重其任也”^[2]。粤海关大关设在广州五仙门内，所辖口岸依职能划分为正税、稽查和挂号三种，以虎门最为重要，其次为澳门，“余如惠、潮，如肇、高、雷、廉、琼，各有港汊，亦各设口岸征榷”，由于广东沿海“在在均有出海门户”，“自海禁既开，帆樯鳞集，瞻星戴斗”^[3]，海外贸易的自由和发达程度实远超前朝。经由广东口岸交易的货物中，陶瓷器仍占重要一席。康熙五十九年（1720），广州十三行公行成立时颁布的十三条行规中，第八条则专为瓷器交易而定。有关瓷器出口的记载比比皆是，如丹麦“雍正年间，有夷商来广通市，后岁以为常。每夏、秋之交，由虎门入口，至广东易买茶叶、瓷器、丝斤”^[4]；瑞典“通市始自雍正十年（1732），后岁岁不绝。每春、夏之交，其国人以土产、黑铅……诸物来广，由虎门入口，易买茶叶、瓷器诸物，至初冬回国”^[5]；乾隆五十八年（1793）敕谕英吉利国曰：“向来西洋各国及尔国夷商，赴天朝贸易，悉于澳门互市，历久相沿……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恩加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6]

清前期海外贸易“商人往东洋者十之一，南洋者十之九”^[7]，与明并无不同，但在官方管理的陶瓷交易口岸方面，明朝难望其项背。其中，总巡口、东炮台口、西炮台口、黄埔口、虎门口和澳门总口均为瓷器出口和转口的主要口岸，所易瓷器当非皆产自广东。粤西高州府吴川县的梅菪总口、芷寮口，石城县的暗铺口、两家滩口以及肇庆府阳江县的阳江口皆产“土碗”^[8]，其必为粤西窑场生产的陶瓷产品。清代高州府窑场占比显著上升，外销的刺激不可或缺。外销对生产的刺激亦见于其他地区，且颇为持久，从“过去潮州瓷器，制作不甚精进，难向外地行销，而海运未开，销路有限……迨近代南洋交通畅达，日用粗瓷大旺……粗瓷大部分输出南洋群岛”等记载中^[9]，便可管窥一二。

（责任编辑：张红艳）

（下转第 061 页）

[1] [清]梁廷相总纂，袁钟仁校注：《粤海关志》卷十七《禁令一》，第 336、348 页。

[2] [清]梁廷相总纂，袁钟仁校注：《粤海关志》卷七《设官（表附）》，第 114 页。

[3] [清]梁廷相总纂，袁钟仁校注：《粤海关志》卷五《口岸一》，第 59 页。

[4] [清]梁廷相总纂，袁钟仁校注：《粤海关志》卷二十四《市舶》，第 473 页。

[5] [清]梁廷相总纂，袁钟仁校注：《粤海关志》卷二十四《市舶》，第 475 页。

[6] [清]梁廷相总纂，袁钟仁校注：《粤海关志》卷二十三《贡舶三》，第 456 页。

[7] [清]梁廷相总纂，袁钟仁校注：《粤海关志》卷二十四《市舶》，第 475 页。

[8] [清]梁廷相总纂，袁钟仁校注：《粤海关志》卷九《税则二》，第 195—196 页。

[9] [清]梁宪华、翁连溪编著：《中国地方志中的陶瓷史料》，第 331 页。

总结、反思与提升。当下同样热门的发展中国学生核心素养要求，给博物馆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同时也让博物馆教育从业者开始反思博物馆教育的真正价值与意义。

（责任编辑：兰 维）

Museum Education Based on Key Competencies: Emotions, Attitudes and Values

He Donglei

Abstract: Since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was put in the first place of the museum functions in the revised “Regulations on Museums” in 2015, all the museums across the country have been giving full play to their educational functions and actively carrying out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n museum education. Nowadays, the national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reform has set new goals and requirements for education. In 2016, the Research Results on the Key Competencies of Chinese Students’ Development was officially released, which was to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education of “fostering integrity and promoting rounded development of people” proposed by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new era, museum education has been endowed with new value and meaning. Museum workers should clarify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museum education,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of museum education in this era, and make museum to be people’s lifelong learning center.

Keywords: Key Competencies, Museum Education, School Education

（上接第 038 页）

Discussion on Ceramics Handicraft Industry in Guangdong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Deng Hongwen

Abstract: There were a large number of ceramic workshops in Guangdong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the ceramic manufacture was thriving. However, only a few kiln sites have been explored or excavated, and even less information has been published. During this period,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eramic handicraft industry in Guangdong included great variety of kiln types, a diversity of ceramic products, and complex features of manufacturing. Besides them, the kiln furniture such as sagger, small circular clay disk or pad, and pillar were common. Chinese words such as fortune, prosperity, longevity, wealth, jade and business names were widely found. The manufactured products, the glaze characteristics of celadon, the decorating style, the burning process and the kiln technology were comparable to the Longquan kiln of Zhejiang from the late Yuan dynasty to the Ming dynasty. The blue-and-white porcelain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different periods due to the big differences of the products during each period, i.e.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the early Qing dynasty, and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resource conditions, the inheritance and exchange of technologies, and the overseas trad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re three important factors which impacted the ceramic production in Guangdong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Keywords: Guangdo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eramic Handicraft Industry